
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争鸣及实践：由重庆学生营观察

刘寿堂^{*1}

【内容提要】:教育如何因应战争的需要,成为抗战初期举国争议的话题。“战时要当平时看”方针的确立并没有消弭争论。在大量迁渝师生亟需抚恤,国民政府被迫采取系列应对措施背景下,重庆学生营得以筹建。学生营在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学习内容等方面有别于普通学校,它既是收容沦陷区师生的特殊形式,也是为匡正当时教育弊端的重要尝试。其存在时间虽短,影响较小,但其得失至今仍值得镜鉴。

【关键词】:战时;教育政策;重庆学生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百业凋零,教育遭受重创。“平、津、京、沪一带相继不守,寇骑所至,厅舍为墟,而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尤为敌人所嫉视,摧残破坏惟恐不力”。^[1]为保存文化命脉,实现抗战与建国并举,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2日下令高校内迁。绝大多数高校虽历经艰难,最终却在后方维持弦诵不辍。甚至一些学校,比如西南联大,虽饱受颠沛困厄之苦,却演绎了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一、战时教育政策的确立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危机与变局中的意义逐步得到认同。“时无论古今,地不分中外,任何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必先求人民心里之振奋,与社会风气之改革,此种根本工作惟教育最有效,且社会之良窳,国家之兴衰,其根本皆系于教育之优劣。”^[2]所以,战事甫发,民族存亡中的教育如何应对变局的问题,就立即引起了普遍关注。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发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要求各级教育务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学校训练要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的变更必须依照部定之范围。文件的发布为乱局中的教育走向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却也加剧了“维持派”与“改革派”之间关于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

(一) 关于战时教育政策的争鸣

“改革派”认为一切均应服务于抗战的总目标,教育不应遗世独立于战争之外。他们主张彻底地改革当前的教育模式,要废止正常教育,代之以战时教育,即通过短期培训,谋求抗战人才之速成。“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以改组和停办,俾师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3]南京沦陷前后,更有人主张所有学校皆应停课一年,专事师生的战技训练,以应战争需要。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亦曾极力呼吁: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是亡国的教育。^[4]该派的观点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支持,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拥护。

“维持派”则认为即使在战时,学生也当潜心向学,学校也应维持课务。为应对时局固然要办理一些特别训练班,但学校教育仍应蹈常习故。著名教育家廖世承曾坚决地表示,“教育本不是一种速成的事业,所谓非常时期的教育,并非要办什么速成教育,彻底的变更教育系统。”^[5]军界耆宿蒋百里先生面对当时中等以上学校大规模的弃学从军浪潮,曾声泪俱下地告诫国人,应尽力设法使青年学生完成其学业,而不可贸然动员其奔赴前线参战。他们看到,学生罢课,学校停学,所谓的全民皆兵,在事实上既无益于抗战,也最终有害于战后的建国。该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当时执掌教部的王世杰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

¹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人，绝大多数教员也认同此观点。

1938年1月7日，陈立夫接掌教育部部长一职。他对战时教育政策采取了审慎而积极的态度。高效团结的教育行政是应对时局的关键，长期从事党务的陈立夫自然深谙于此。所以“受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部中的人事安排。”^[6]他所任命的张道藩、顾毓琇、吴俊升等教育部核心成员都尽心尽力地执行了他的政策。陈立夫坚决反对以战时教育取代正常教育的提议，力主抗战背景下教育事业的常态发展。他在1938年2月发表的《告全国学生书》中指出，“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种学校之设立，实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7]他认为，学生对国家应尽的主要义务就是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当全力以赴。当然，他也同意了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改革，“为建国预储人才，但应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8]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应邀发表了演讲，提出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战时需要兵员，就无条件地把青年们从课室与实验室赶到战争环境里去做应急工作。随后，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郭威白等22人的临时动议，将这“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思想确定为战时教育之最高指导原则。^[9]

“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在各方争执不下的背景下，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训词的方式出台的。如果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是一种抛弃小我、闲散、自私而能积极面对战时环境，共体时艰、共谋发展的生活态度，“战时要当平时看”则说明了在教育政策与实施上，应周全考虑而不偏废的必要性。^[10]从某种程度看，它既是最高当局对初掌教育的陈立夫的教育政策的高度肯定与积极支持，也是对两派观点的平衡与调和，更是非常时期国家教育方针的一种权宜之策。这一指导思想虽然确立，但战时教育究竟如何因应抗战建国需要，双方的争论并未停止。尤其是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去贯彻“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思想，也存在诸多分歧。战前，社会各界对各级教育中存在的教学内容空疏、教育模式模袭他国、教育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问题多有批判。值此民族危机加剧之际，如何革除教育弊端以因应国难的问题更为社会关注。此前此后的一系列争论，为教育界尝试各种新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能。

（二）迁渝师生亟需抚辑

随着战局推进，国府迁渝，数以十万计的员生从沦陷区辗转汇集于大后方。相对于高等院校内迁的组织化、整体化、规模化，中等教育的师生迁移则呈现出分散性、自发性、盲目性。在交通极端困难、物资极度匮乏的境况下，他们的内迁之路更加漫长而艰辛，有些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对内迁员生予以抚辑，“成千累万之学生及青年教职员流离失所，生活维艰，投笔有心，请缨无路，倘不设法予以收容及训练，不惟文化上之损失滋大，抑恐无救济热情有为之青年于亡家破国之余，精神上毫无归宿，陷于消极悲观之境。”^[11]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先后设置“战区来渝学生指导处”、“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安置战区迁出的学生。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打破中央不直接办理中等教育的传统，在大后方先后筹建了30余所国立中学，设置了贷金制度以助力学生完成学业。教育部招募战区流亡教师组成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解决了部分国立中学的师资困难。因为陪都之故，加之主要的文化教育机构随国府迁渝，所以重庆成为员生流亡的首选之地，大量流亡员生滞留重庆城区等待政府救济。但重庆城区地狭人稠、物资匮乏、交通紧张，安置迁渝的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等师生已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政府急需筹设新法，以解决战区来渝的中等教育师生的失业失学问题。

二、重庆学生营的筹建

战前，教育界就已有改进教育模式、组建青年营的倡议。论者认为在新时期营组织的教育模式，“可以收获到野外教育、易地教育、职业教育、生活教育之实际的功效。”^[12]战事初起，国民政府教育部社教司陈礼江司长在向媒体谈及战时教育改革时亦有组建学生营之设想。他认为，学生营为战时环境中新产生之一种教育实验，凡报考国立中学高初中学生除高中三年级外，如志愿从事乡村服务者，在国中额满见遗时者，视其考试成绩，即可送至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办之学生营。

（一）学生营的建立

战时急迫的环境需要，使学生营成为了现实。“教部为救济战区失业失学之员生，并使教育适应战时环境计，特在重庆成立了学生营，采一面读书，一面服务之流动式教学。并已派黄式陵为主任，筹备一切事宜。”^[13]当时任职浙江教育厅的黄式陵此前一直参与战时民众教育，在战争防护、警备、防空教育与训练等方面经验甚丰，曾与人合撰《防护团组织与训练》等书，广受好评。所以学生营的筹建，“由教育家黄式陵氏向教育部建议，经部慎重审核，度为切合战时的需要，准予试办。”^[14]随后，黄式陵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重庆学生营主任。

1938年初黄式陵由汉抵渝，租住重庆三元庙市立第二小学，设置临时办事处，开始筹建学生营。临时办事处首先从战区来渝中小学教师组成的四川服务团中选聘学生营教师十余名，随后公布了招生章程并开始招录第一批学生。考生须是来自战区的初、高中学生，且要先在教部登记，待考试合格后方可录取。考试分两试：第一试为体格检查与口试，第二试为学科试验。凡第一试不合格者，不得再与第二试。1938年5月4日，学生营在重庆江北举行开营典礼，学生暂被安置于市立二小内。5月10日重庆学生营第一大队135名学生迁入重庆南温泉开辟营地，学生营正式开始运行。

（二）学生营的性质

在学生营试办一学期后，为回应外界对学生营的关注与质疑，营主任黄式陵先生1938年11月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纪念周活动上，专门就学生营的性质及运行等作了演讲。他回顾了学生营的创办经过，介绍了学生营的办学原则，简单总结了学生营的得失。按其解释，学生营的办学原则、学生编制等方面均迥异于一般学校，创办学生营从根本上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学生营在方式上是顺应战时环境，在内容上适合战时需要。“学生营不以校政机关为主体，以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不以固定校舍为限制，以勾通都市与乡村的文化；步行乡野周览风物，以培养国土观念与民族情感，露营地利用自然以锻炼身体，旷达胸怀……教员教学生以自教，学生教民众以自教，造成上下一体，经纬交织的生活教育网。”^[15]学生营既注重青年学生储备基础知识以利于长远发展，又要求学生在学习与服务中体验知行合一，所以半天学习文化知识，半天服务乡村建设。学生营实施军事化管理，要求营员自理营务，旨在训练师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学生营在育人方式上，启发重于训练，诱导重于管束，师表重于书本，重在养成青年的自信心、自尊心、自主心。总之，与一般学校相比，学生营的原则就是教学内容实用化，教学方式社会化，教学组织军事化。

（三）学生营的编制

学生营采用军事编制，按照学生在知能、体格、年龄、性别方面之差异，确定编制。营员分别编为若干小队，每小队以十人至十五人为准，小队是生活教学单位；三小队为一中队，中队为知识教学单位（相当普通学校一学级）；三中队为一大队，大队为技能教学单位，政治教学贯通之；一大队至三大队为一营。营辖各大队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仍须受营的指导与管理。学生营在承担其他服务性工作时，须就工作性能及轻重另行分班。但在学生营的实际运行中，尤其是进行户外的服务活动时候，学生小队才是最基层、凝聚力最强、最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重庆南温泉学生营第一期共135名学员，全部为男生，分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中一、二年级共四个班，编为一个大队。按教育部规定，该营初中毕业仍可考入其他高中，高中毕业亦可入大学。

（四）学生营的教学内容

学生营的特殊性质及功能决定了其教学内容与普通中学有较大差别。按照创办者的设计，主要包括知识教学、技能教学、政治教学、生活教学四方面：知识教学以充实青年普通教育与基本学识为目标。其内容是在原有课程基础上酌加增删而成，主要有国文、算学、史地、自然与英语等五科。教学强调利用实际环境，分别为采集、观测、调查等实际工作；技能教学以造就青年军事技能及特殊技能为目标。其内容以军事训练为主，以特殊技能训练为辅。特殊训练侧重一些专业技能，如骑术、驾驶、游泳、划船、防空、摄影等；政治教学以培养青年民族意识及组织能力为目标，是在原有的公民课基础上的拓展延伸，讲授内容包括总理遗教、抗战建国纲领、国际问题研究、日本问题、民众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此外还有小组活动，旨在训练成员的组织能力；生活教学以锻炼青年体格、性情及团体纪律为目标。课程内容分为人格修养、营地管理、健康娱乐、人事处

理、风纪仪态、公安警卫、家政园艺（专为女学生设置）等，以实行新生活规律为准。^[16]可见，相对于普通学校教育，学生营的教学内容充分考虑了抗战因素，通过大幅压缩知识学科的教学课时，增加了诸如防空、军事训练、日本问题研究、抗战建国纲领等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其技能教学、政治教学、生活教学涉及的领域庞杂，尤其是特殊技能教学方面，多是一些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类学习，不仅需要专业师资，而且需要专业设备与设施。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针对学生营这种带有收容救济性质的教育机构来说，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三、重庆学生营的运行及发展

学生营是在国家战争状态下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它既是户外的学校，也是半军事化的学校。当学生流动时是学生大队，固定时则是学生营。学生营的永久营地设置在南温泉，建有若干营房，内储各种参考书及杂志、仪器等。此处既是各种集会所在地，也是雨天庇护地，还是文化课的集中教学点。各小队或中队学生则常常处在运动中，他们在附近某一个地方住一至二月后，即迁往另一个地方。他们以行军露营的方式巡回于各乡镇、各村寨，实行一面教学、一面服务的教育模式。

（一）学生营的施教模式

学生营在施教方面，“不主呆板，随时随地，均可对学生施以各种教育。”^[17]文化课授课时间通常被安排在上午，初中部每周三十一小时，高中部每周三十二小时，其内容与普通中学相近。“其他各种教学及服务时间，酌依驻地需要（如农忙等）与习惯而活动支配的。授课地点没有一定，有时在树阴下，有时借用公共场所，每一学生只有一块木板，一张小竹椅。到处是他们的课堂和自修室，这样的教学方法，比一般机械式的教学确定要灵活得多。”^[18]除文化课的学习外，他们还要参与乡村服务。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深入邻近村庄，协同推行民众教育或从事其他工作，比如调查地方上的历史地理与风俗民情，办理街头壁报，到壮丁大队或地方学校去演讲或教授唱歌，参加民众团体的集会，开展妇女儿童识字教育，教授国防常识等，以各种形式服务于抗战需要。

（二）学生营的管理模式

学生营的日常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每天晨起均有早操，每周一、二、五、日晚临睡前有晚会。“庄严的工作把四十九个人的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部工作的机器人，每个独立的齿轮都紧密地联接着整天在转动。‘十六与八’已经变成我们的口号，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以二十四分之十六的光阴付与工作，二十四分之八的光阴留给自己休息和睡眠。”^[19]学生营每个小队均安排有导师一名，与学生同食同住同行。小队晚会由导师主持，方式灵活生动，既联络了感情，也考察训练了各自的个性。鉴于教学与服务的特点，学生营废止了星期日（国家纪念日不在此限）及暑假，酌延长寒假，以避冬季露营之不便。“学生营的行军路线，以公路或河流为准。学生营的营具、教具之设计、制办，均适合行军运输之要求……如在战区或邻近地带，须有化整为零之紧急处置办法，并须与当地军队取得密切之联络。”^[20]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既与战时环境相适应，也保证了学生营的高效和安全运行。

（三）学生营的政策保障

学生营是教部指令下对新教育模式的探索，其建立得到了教育部的政策支持与财政资助。在组织关系上，学生营归口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管，陈礼江司长对试办学生营寄予了期望与热情。教育部明令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的教员参与学生营的创办，在师资上保证了学生营的教学条件。教育部规定学生营的初、高中各部均可与国立高中以及大学实行学制衔接，解决了其毕业生的“出口”问题。教育部不但承诺学生营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公家承担，还给予入营全部学员以公费待遇，提供免费食宿与文具及基本生活用品，这对那些承受国破家亡之苦千里来渝的流亡学生来说，入营不仅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更是在兵荒马乱岁月里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另外，学生营的创建者黄式陵不仅在理论与制度上对学生营有缜密的设计，有尝试新教育模式的激情与勇气，在办理营务的实践中也体现出了较强的执行力。

（四）学生营的解散

学生营在南温泉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深得营地附近民众的信任，也得到了政府的好评。“教部以学生营制度试验以来，颇有成效，近又筹设西康学生营。”^[21]国民政府正是基于对重庆学生营成绩的认可，才有了增设西康学生营的计划。尤其是学员们大多克服了娇矜之气，纷纷走出校门，服务社会。学生营的精神生活积极向上，当时媒体曾有报道，“有的闭着双睫沉醉在午睡的蜜梦中，有的手里拿着书得意的在诵读着，有人拿起了口琴忘却了半日的辛劳在吹奏着，每个人的和颜映射出愉快的心情。”^[22]学生营随后在1939、1940年均招录新生，并有少量女学员入营。但是，学生营的性质决定了它只是非常情况下暂时性的、辅助性的、补充性的教育形式，是解决战区迁渝学生的失业失学问题的权宜之策。所以，重庆学生营在1941年时被教育当局以“不合教育体制”为由而解散。

四、重庆学生营的历史意义

早在战前就已经有学者提议以营组织的方式进行教学，抗战的发生使这种倡议变成了现实。但是，学生营自成立之日起其合理性就颇受质疑，“这种教育方式，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育，用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用以有效的适合国家政治的配备，应该是短期的，暂时随地可以动的组合。”^[23]期间，因其招生的程序问题也引起了考生对其公正性的质疑。创办重庆学生营的初衷是解决战区迁渝学生的失业失学问题，所以川籍生员自然不属于招录对象，但有学生向媒体批露有川籍学生通过“运作”而得以入营学习，致使真正战区来渝学生往往因为名额被占而失去进营学习的机会。^[24]这些负面事件无疑有损学生营的新教育模式的正面形象。学生营所预期的那些教学目标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并没能全部实现。事实上，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中它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相对于规范的学校教育来说，它的模式显得太另类了。更重要的是，学生营是应战时的需要而开展的一种教育尝试，战局的不断变迁，推动国民政府对教育政策做出相应调适。一方面，大量国立中学开始在后方建立，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25]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特别组建了战区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专门对来自战区的青年学生进行招致、训练、分发。至此，学生营的使命也就结束了。随后建立的西康学生营虽然在开发边地、救济战区生、发展藏区文教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面对复杂而敏感的民族问题以及“赤化”问题，它也摆脱不了与重庆学生营一样被停办的命运。

重庆学生营从1938年初开营到1941年秋学生营解散，其间历时不过三年多。在中国教育史上，无论是从规模、范围还是影响力等方面看，学生营都无法与当时的高校内迁、筹建国立中学、设立贷金制度等浓墨重彩的事件相提并论。但客观地讲，学生营的历史意义仍不容否定。学生营的创建者黄武陵主任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纪念周的演讲中，曾对学生营的意义作过总结。他从积极消极两个方面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较为全面系统地归纳出学生营在当时设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除了本文前述的战时学生失学、教员失业亟需救济等现实问题外，学生营的创办在事实上避免了敌机对文化机关的轰炸，转移和保存了文化实力。在笔者看来，学生营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其实践意义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是对当时抗战建国方略的践行

在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中，无论是“改革派”还是“维持派”，都认同抗战的胜利是当时国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必当全力以赴，只是两派对这个目标的实现路径存在分歧。《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要求抗战与建国并举，“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策略也体现了不因战事而废弃常规教育的要求。学生营模式正是这种要求的践行，它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于一炉，以为统一目前双轨学校制系统之准备；使学生训练与民众训练相辅为用，以融通训练之内容，增强训练之效果；使战时服务与战时教育兼筹并顾，以充实教育之内容，扩大服务之功能。^[26]学生营“一面读书、一面服务”的创设理念，至少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看来，正是实践抗战建国方针的直接体现。

（二）它是对新教育模式的宝贵探索

中国近代化以来，各种教育思潮异彩纷呈，各种教育实践粉墨登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平民教育、国家

主义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进程。“六十年来教育思想之进展虽为曲线，但却有共同的轨迹之寻；这轨迹底第一线是由模仿的进而为自觉心，即由趋步他人（日本）底后尘进为自己设计解决自己的问题。”^[27]战前教育界人士对于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一味模仿美国、日本、德国模式多有诟病，对当时的教育脱离社会现实、过于迂阔空疏的现象多有批判，要求探索自己特色教育模式的呼声不断高涨。学生营这种将读书与服务、学校与军营、课堂与社会打成一片的做法，既因应了战争环境的需要，更是对改革探索中国教育模式呼声的积极回应。学生营以锄头、枪杆、书本作为营帜，可见其教学内容注重知识、劳动、武力三方面的平衡发展，旨在造就自教、自养、自卫的全才。在国家民族存亡攸关的战争背景下，其实践意义自不待言。学生营的创办与解散，都与当时各界对普通学校教育的争论有关。学生营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材、教具、运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成败，又为普通学校的改进提供了参考与范式。

（三）它有效地提升了乡村文化之水准

学生营按照半天读书、半天服务的模式运行。学生营的驻地在南温泉，行军路线沿公路河流推进，深入营地附近广大的乡村，巡回开展调查、宣传、教育等其他服务。“我们住在一个颇大的院落里，每天从早饭后晚会前经常地挤满了来访的客人妇女小孩，中小学生，他们都成为我们最亲切的友人，我们也不厌其烦的每天设专人招待谈话，介绍书籍，教授唱歌就是我们招待的内容。”^[28]战前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一直是教育文化的边缘地带。学生驻地南温泉，地处重庆南郊，虽为重庆南大门所在，但一直经济落后，文化荒芜。学生营在南温泉地区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的民众教育运动，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增强了抗战的群众基础。教育如何因应时局、如何服务社会，七十多年前的学生营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 [1][3] 教育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8页
- [2] 冯开文：《中华民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 [4] 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 [5] 汤才伯主编：《廖世承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 [6]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37页
- [7] 《专载：教育部长告全国学生书》，《广东教育厅月刊》，1938年第2期，第2页
- [8] 韦卓明著高新民选编：《韦卓明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7页
- [9] 于潇：《社会变革中的教育应对——民国时期全国教育会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
- [10] 朱庆葆 陈进金 孙若怡 牛力等：《中华民国专题史·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
-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2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 [12] 《教育厅筹建青年营以鼓励青年旅行实施野外教育及提倡劳动服务案》，《浙江教育》1937年第二卷第2期，第21页

-
- [13] 《成立学生营》，《教育通讯（汉口）》1938 年第 2 期，第 4 页
- [14][18] 寿昌：《重庆南温泉的学生营——试办中的新教育制度》，《学生杂志》1939 年第 19 卷第 1 期，第 119、120 页
- [15][16][20][26] 《教育部指定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创办学生营》，《四川月报》1938 年第 12 卷第 3/4 期，第 259~260、262、261、263 页
- [17] 《学生营近况》，《教育通讯（汉口）》1938 年第 10 期，第 7 页
- [19][28] 《四川的学生营》，《战时知识》1938 年第 2 期，第 18、19 页
- [21] 《教育部筹设西康学生营》，《教育通讯》1938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11 页
- [22] 李蕾：《新教育的实验——学生营》，《民意周刊》1938 年第 38 期，第 13 页
- [23] 李纪生：《谈“营”组织的教育方式》，《前线旬刊》第 2 卷第 26 期，第 17 页
- [24] 《学生营为什么不公开招收四川学生》，《抗战青年》1938 年第 1 卷第 8 期，第 15 页
- [25] 余子侠：《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80 页
- [27]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11 页